

《波罗的海的革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及其独立之路》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作者：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

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

虽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8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波罗的海海滨的政治风暴在这个超级大国轰然崩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如此，英国历史学家和《泰晤士报》资深记者阿纳托尔·列文最近出版的著作——《波罗的海的革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及其独立之路》能够引起西方读书界的重视，并不仅仅在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近年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而主要归功于作者对这三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之透彻、表达之精确。这大概也只有列文能够做到，因为他是居住在拉脱维亚的日耳曼贵族的后裔，并且曾经当过好几年《泰晤士报》驻波罗的海三国的记者。这本著作中有关导致这三个国家独立的重大事件、政治团体、重要人物的详细描述是研究工作者不可多得的材料。当读者读到的当地大批前苏联高级干部长期以来过着一种秘密的“二元生活”（这些高级干部表面上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唯命是从”，暗地里竭力维护本民族的特性。当事人在私下里称这种做法为：社会主义是形式、民族主义是实质），他们对这些人在一夜之间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和英雄就不会感到不可理解了。

习惯于“宏观地”观察国际事务的战略家们往往将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对于“怀着淡淡的思乡愁绪回到故国”、并在波罗的海之滨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列文来说，这三个国家的差别太明显了，稍不注意就会对它们的共同点“视而不见”。就民族和语言而言，在北部的爱沙尼亚人是北欧古罗马人的一支后裔，说的是同现代的芬兰语有亲缘关系有乌格罗—芬兰语；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是唯一继承了属于印—欧语系的波罗的海语的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语言是相通的，但是根本无法同爱沙尼亚人对话。这三个民族最主要的相同之处不是在于它们具有某一特征，而是在于它们都不具有某一特征：生活在斯拉夫人的传统居住地——东欧大平原上的这三个民族都不是斯拉夫“大家庭”的成员。

尽管这三个民族对斯拉夫人、尤其是“野蛮的俄罗

斯人”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厌恶（直到现在人们在这三个国家旅行的时候还能够经常听见当地的母亲这样教训孩子：“你们的举止象俄罗斯人一样粗鲁”或者“你的吃相像俄罗斯人一样难看”），但是最初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投入苦海的是来自西方的、被他们视为“同胞兄弟”的条顿族骑士。从此，日耳曼人是土地的主人和统治者，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是农奴。立陶宛同俄罗斯的关系则有一段相当“曲折的”历史。在中世纪时，立陶宛大公曾经将其统治范围向南延伸至黑海。但是在14世纪立陶宛与“斯拉夫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波兰结盟以后，这个民族的面貌和命运都发生了变化：先是立陶宛贵族“全盘西化”，即完全接受了波兰的语言和文化（只有立陶宛的农民继续说祖先留下来的语言），后是在斯拉夫大家庭的内讧中被征服了波兰的俄罗斯“稍带地”吞并了。因此，立陶宛和遭遇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的。

曾经热烈地支持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摆脱苏联统治”的西方读者在读完全书以后或许会感到有点“失望”，因为出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列文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这三个国家的历史，从而使她们“突然变得不那么值得同情”了。在与周围的民族、尤其是与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的交往过程中，这三个国家的“反复无常”实在不能“恭维”。日耳曼民族对19世纪下半期这三个国家民族主义感情的复苏起过重要的作用。当时统治它们的沙俄政府禁止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用拉丁字母印刷书籍。立陶宛的知识分子就在普鲁士政府的庇护下在境外印刷立陶宛语的书籍，然后将这些书籍肩扛背驮地偷偷运入故乡。因此，19世纪立陶宛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驱也被称为“肩扛书籍的人”。但是一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获得独立，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严厉的“非日耳曼化”的政策：剥夺和驱逐大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日耳曼居民。

尽管立陶宛的命运多灾多难（它的首都维尔纽斯在本世纪内就换了13次主人），但是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走过的道路远非“曲折”一词可以概括的。在目前立陶宛的历史教科书中，1939—1944年这段历史（即从立陶宛根据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托洛甫秘密条约的补充协定归前苏联占领至1944年被苏联红军“收复”期间）象是一个宇宙中的“黑洞”：在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字中包含着这个民族一言难尽的“过失”、痛苦、屈辱和耻辱。1939年9月，当与德军夹击波兰的苏联红军进入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时候，当地讲立陶宛语的居民将红军视为帮助他们摆脱波兰贵族统治的“战友”，当地的犹太人则将红军视为帮助他们免遭法西斯蹂躏的“救世主”。但是当苏联政府将成千上万的当

费城寻古

刘长敏

地居民强迫迁移到中亚地区去的时候，立陶宛人才失望而痛苦地意识到，已经西欧化的民族是难以“适应”俄罗斯式的统治的。于是，在1941年6月立陶宛人配合执行“巴巴罗萨军事计划”（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的德军猛烈袭击败退的苏联红军。不少立陶宛人再次天真地以为被当成“解放者”予以欢迎的德国法西斯会允许他们享受真正的自治，从而将自己命运同“第三帝国绑在一起了。由讲立陶宛语的居民组成的“萨乌古马”（即立陶宛傀儡政府的保安队）还被派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去帮助德国法西斯建立“新秩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居住在立陶宛的犹太人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立陶宛境内居住着众多的犹太人。他们中出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因其讲意第绪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的居民占该城人口的43.5%而被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城内的斯特拉斯辰图书馆所收藏的意第绪语书籍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纳粹统治时期，立陶宛境内的犹太人被送往设在波纳利的集中营，其中的12万人后来就长眠在波纳利附近树木繁茂的山谷里了。90%以上的殉难者是被他们以前的同胞、“萨乌古马”枪决的。

立陶宛傀儡政府及其武装还积极协助德军围剿由当地讲波兰语的居民组成的、效忠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国内军”和由俄罗斯居民组成的游击队。当然，立陶宛人后来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红军在收复立陶宛以后立即对立陶宛傀儡军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剿”。尽管在这场规模不小、直到50年代下半期才告结束的“清剿”中双方伤亡的人数均达数万人之多，但是因为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愈演愈烈的冷战中，再加上前苏联政府对于这种国内问题一贯是秘而不宣的，因此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对这场“热战”几乎没有任何报道。

本人是立陶宛波兰居民后裔的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采斯拉夫·米洛斯茨在读完列文的这本专著后感慨系之。他最近访问波罗的海三国后认为，这三个国家至今仍然在矛盾中彷徨和徘徊：它们既对“苏联埃制度”深恶痛绝，又对被废止的集体农庄制度无比“眷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前苏联地区只有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集体农庄运转良好、效益可观）；它们既对以前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所干的“蠢事”暗暗后悔，现在的领导人又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们既害怕西面的德国和东面的俄罗斯，又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因此，米洛斯茨心有余悸地说，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帮助这三个国家维持民族特性、取得独立的内部动力，也是他决心与这三个国家“保持距离”的重要原因。

（石雅慧）

费城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历史名城。由于这座城市的名字与美国的开国历史联系密切，因此，费城对于我这位学历史出身的游客来说，便有着不同一般的吸引力。

到达费城的第二天，我便去参观位于市中心的独立宫遗址。从市场街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自由钟纪念馆。它座落在一片绿盈盈的草坪之中，为一单层长方形白色建筑。我们这些游人在入口外自动列队，缓步入馆，一睹那只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洪钟之风采。我认真端详着这只名钟，外观上看，它与中国古代的大铜钟相差无几，但不知为何，钟身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馆内游人太多，我无法听清讲解员的解释，也无意去专门了解。我想象那也许是欣喜若狂的美国人由于当年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挥舞鼓锤敲钟不已，用力过重所致吧。

自由钟纪念馆的背后，便是我仰慕已久的独立宫旧址。这是一组白色的两层小楼，中间的主体建筑就是独立宫，宫的两侧各有一栋小楼，左边是费城的旧市政厅，右边是议会大厅。独立宫门前，矗立着托马斯·杰斐逊的全身雕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其不朽的功勋，载入了史册。杰斐逊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早年坚定不移地把推翻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始终站在领导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1776年，他主笔起草《独立宣言》，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后来担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

独立宫貌似平常，但由于美国建国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它的地位便不同一般。一是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独立宫内隆重开幕，会议宣读并通过了《独立宣言》。这篇历史性的文件成为当时美国人